

赵小兵◎著



俄汉互参式意义重构的 译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小兵◎著



俄汉互参式意义重构的 译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汉互参式意义重构的译学研究/赵小兵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 - 7 - 5203 - 3397 - 9

I. ①俄… II. ①赵… III. ①俄语—翻译—研究 IV. ①H3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187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5.25
插 页 2
字 数 513 千字
定 价 1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为翻译学的实证性基础研究，将语法理论、语篇理论、意义理论、哲学解释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翻译研究，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以中俄名家名译作者自译为语料，揭示了翻译意义重构的一些规律，语料丰富详实，具有很强的翻译指导意义。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双语互参意义重构译学研究之必要	(1)
第二节 翻译“意义”观回顾	(5)
第三节 该研究的主要目标、内容、方法、理论 价值和意义	(10)
第四节 俄汉互参式意义重构研究引论	(13)
第二章 俄汉语词汇翻译问题	(18)
第一节 俄汉语名词翻译问题	(18)
一 俄汉语名词的定义、分类及特点	(18)
二 俄汉语名词互参探译	(21)
第二节 俄汉语动词翻译问题	(56)
一 俄汉语动词的特点	(56)
二 俄汉语动词互参探译	(59)
第三节 俄汉语代词翻译问题	(90)
一 俄汉语代词的特点	(90)
二 俄汉语代词互参探译	(93)
第三章 俄汉语几种典型句式翻译问题	(130)
第一节 俄汉语存在句翻译问题	(130)
一 俄汉语存在句的特点	(130)
二 俄汉语存在句互参探译	(136)

第二节	俄汉语(准)判断句翻译问题·····	(155)
一	俄汉语判断句(是字句)的特点·····	(155)
二	俄汉语判断句(是字句)互参探译·····	(167)
第三节	俄汉语被动句翻译问题·····	(196)
一	汉语被动句·····	(196)
二	俄语被动意义句·····	(204)
三	俄语被动态句汉译探讨·····	(208)
第四节	汉语包孕句与俄语相应句式互参探译·····	(239)
一	汉语定语包孕句与俄语相应句式·····	(241)
二	汉语主语、宾语包孕句与俄语相应句式·····	(260)
三	汉语包孕谓语与俄语相应句式·····	(266)
第五节	汉语次品(末品)补语与俄语相应句式 互参探译·····	(279)
一	汉语次品补语、末品补语·····	(279)
二	俄语的后置形容词(形动词)结构与汉语的 次品补语·····	(280)
三	俄语的后置副动词结构与汉语的末品补语·····	(291)
四	次品补语、末品补语之用于俄汉翻译再论·····	(295)
第四章	俄汉语语序翻译问题·····	(307)
第一节	俄汉语小句词序翻译问题·····	(308)
一	俄汉语小句词序与语义、修辞、交际(功能) 理据·····	(308)
二	俄汉语小句词序趋同对译·····	(309)
三	俄汉语小句词序趋异变译·····	(315)
第二节	俄汉语超句体(句群)语序翻译问题·····	(319)
一	俄汉语中的超句(句群)概念·····	(319)
二	语序趋同顺译·····	(321)
三	语序趋异变译·····	(338)
第三节	俄汉语引语书写翻译问题·····	(357)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俄汉语对话引语书写的差异	(357)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俄汉语引语书写趋同现象	(364)
三	俄汉语引语书写趋同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370)
第五章	俄汉语语篇翻译问题	(379)
第一节	俄汉语语篇衔接翻译问题	(379)
一	语篇衔接概念	(379)
二	俄汉互参语篇衔接探译	(380)
第二节	俄汉语语篇连贯翻译问题	(405)
一	语篇连贯概念	(405)
二	俄汉互参语篇连贯探译	(406)
第三节	语篇中的意义与翻译问题	(438)
一	译者之语篇意识	(438)
二	语篇中的意义与翻译问题	(443)
第六章	文学翻译中的意义重构问题	(449)
第一节	文学翻译：意义筹划与突显论	(449)
一	文学语篇中的“意义”	(450)
二	理解—意义筹划	(453)
三	表达—意义突显	(462)
第二节	翻译中的意义突显与风格艺术美	(470)
一	翻译中的意义突显六法	(470)
二	翻译中的作家风格艺术美	(476)
第三节	文学翻译：双语互参式审美意义重构	(490)
一	文学性重构	(490)
二	在译者意向中的审美意义重构	(496)
三	双语互参式意义重构	(503)
第四节	俄语诗歌汉译之审美意义重构探析	(512)

一	意象再造存含蓄诗意	(513)
二	意境再造兼顾诗语形美	(516)
三	意义重构采用双语互参法	(519)
第五节	双语互参在俄语诗歌汉译中的作用	(523)
一	双语互参而生译	(523)
二	诗歌翻译之双语互参式审美意义重构	(524)
三	诗歌翻译中的双语互参现象	(525)
末 章		(533)
一	翻译定义的演进与翻译观念的更新	(533)
二	主要观点及创新点	(539)
三	论余剩语	(541)
参考文献		(544)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双语互参意义重构译学研究之必要

古今中外，翻译研究一直是伴随着翻译实践的，几乎与翻译实践一样古老，它也同任何一门新兴学科一样方兴未艾。可以举出大量翻译研究源于翻译实践的例子，我国古代如众多的佛经译序，近代如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傅雷的《〈高老头〉重译本序》，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等（罗新璋，1984），直至当代为了学科建设的比较系统的翻译研究，如辜正坤的《中西诗歌鉴赏与翻译理论》、许渊冲的《文学与翻译》和《翻译的艺术》，许钧的《翻译论》，郑海凌的《文学翻译学》，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下的翻译研究（吴志杰，2009），走向融合与超越的辩证研究（贾正传，2008）等，不可胜数，无一不是与翻译实践相关的。中国译论蔚为壮观，各种翻译研究专著和论文，加上各种编著如朱志瑜、朱晓晨的《中国佛籍译论选集评注》，罗新璋主编的《翻译论集》，刘靖之主编的同名文集（《翻译论集》），《翻译通讯》编辑部主编的《翻译研究论文集》，张柏然、许钧主编的《译学论集》和《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杨自俭、刘学云主编的《翻译新论》，奠定了中国译学研究的基础，研究资源广博深厚。这些翻译研究代表了 21 世纪初中国翻译研究的成果，自董秋斯倡议建立中国翻译学以来，自罗新璋在《翻译论集》中发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以来，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与现代

转化问题探究就从未间断过 [沈苏儒, 1991; 张柏然、姜秋霞, 1997 (2): 7 - 16; 孙致礼, 1997 (2): 10 - 12; 刘重德, 2000 (7): 34 - 37; 杨自俭, 2004 (1): 111 - 113; 王宏印, 2003; 张思洁, 2006]。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译论, 具有国际学术视野, 借鉴国外翻译理论和相关科学的成果而进行系统化、专门化的翻译研究, 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翻译之道研究 (曹明伦, 2008, 2012; 王东风, 2009), 以及中西译论的对比研究 [谭载喜, 1999 (6): 25 - 28; 2000 (1); 2000 (2): 14 - 18; 刘宓庆, 2005], 已成为目前我国翻译研究的明显趋势。

国外翻译史上的众多译论, 如西塞罗的翻译论, 昆体良的翻译竞赛论, 路德等人的圣经翻译论, 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直至近现代纷繁多样的翻译研究, 异彩纷呈, 令人目不暇接。但“现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应该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事情, 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 (简称‘二战’) 为分割线, 在‘二战’之前的可以划归传统翻译研究, 而‘二战’之后的可以统称当代翻译研究。” (刘敬国、何刚强, 2014: 186) “二战”以后, 翻译研究逐渐走上了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路子, 逐渐摆脱了传统译论评点式的言说范围, 形成了翻译研究的不同流派。从翻译学语言学派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到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进入 21 世纪以后, 翻译研究领域又陆续涌现了一些新的流派和理论体系, 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

如今, 翻译研究呈现出跨学科和多元化研究趋势。例如, 曼迪 (Jeremy Munday) 对“翻译研究”下的定义: “翻译研究是一门与翻译理论和现象相联系的新学科, 其本质是多语言性和跨学科性的, 涵盖语言、语言学、交际学、哲学以及一系列文化研究内容。” (Munday, 2001: 1) 不仅翻译的本体论研究, 而且语境、伦理、权力、冲突等与翻译有关的因素也进入了翻译研究视野。例如, 当今国际上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蒙娜·贝克教授的翻译学论著《翻译与冲突》, 被我国学者潘文国评论为“此书的出版具有划时代性, 它标志着国际上翻译研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是翻译的‘文化转向’以后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潘文国, 2011: 5) 值得注意的是,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

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语料库翻译研究。“语料库翻译研究无疑具有自身的优势，如对翻译共性（the universals of translation）的研究。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语料库翻译研究必将表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它对翻译研究的贡献也将会越来越大。”（刘敬国、何刚强，2014：193）

不同流派、不同视角的翻译研究之间观点的碰撞与交流（例如，苏联时期的翻译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之争），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促使翻译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全面的研究之路。但诚如张柏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指出的，译学研究如“作（译）者研究系列”“（作）译品研究系列”“读者研究系列”，属于对存在者的认识论上的探讨，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针对翻译活动和阅读活动本身的翻译本体论探索（张柏然，1997：55-63）。21世纪后，从译者主体视角的翻译研究越来越多，例如，人们对译者的主观性和变译本质（黄忠廉，2002）已经有了相当认识。

中国译论和国外翻译研究于我们颇有借鉴意义，但在具体的外汉双语之间，系统深入探讨翻译学理的论著不多，且多涉及英汉比较与翻译研究（杨自俭，2010），翻译研究与俄汉双语发生关联的寥寥无几，颇有翻译之道与翻译实践脱节之嫌。当然，国内外语界每个外语系都开设有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但外语学界、俄语学界真正在具体外汉语互参基础上进行比较系统的翻译研究，密切联系翻译实践来探索翻译学理的研究并不多，俄汉语互参翻译研究是很新的课题。实际上，关于双语互参于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哈蒂姆、梅森（1990）早有言及：“对译者来说，每一个问题都牵涉两种语言系统，仅对某一语言中某一词项（语项）的分布进行陈述，这根本不会有什么特殊价值……”（哈蒂姆、梅森，2005：36）与此同时强调了语境意义和语言活动发生于其中的情景的社会语境，这样翻译学不仅与对比语言学密切相关，而且与语义学、语用学、语篇理论、语境理论密切相关。国外几乎没有汉语与外国语之间的翻译研究，难以想象一个外国学者以其本国语与汉语互参比较进行翻译研究，这项工作理应由中国学者自己来做（许渊冲，2006）。俄语翻译学科建设面临着俄汉双语

双文化互参译学研究的急迫性和必要性。

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双语）^①、意义、译者是最核心的关键词，意义、语言与译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最根本的翻译问题，尤其需要结合具体外语和汉语作深入研究。外语学者应该重视相关双语的研究，不论是外译汉，还是汉译外，这也是外语界培养外语人才和翻译人才容易忽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探讨，恰恰是解决翻译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已有学者指出外语专业（包括近年来新设立的翻译专业）的学生偏重外语、忽视汉语的现象，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出现汉语水平跛脚现象，认为一味强调译者需要通晓外语及其文化与历史已经不合时宜，兼顾译者的汉外语两方面的修养方为上策（吴志杰，2009：38）。翻译从根本上讲，只有借助语言的帮助才行，而且是相关的双语（译入语和译出语），“双语是翻译的基础”（Алимов，2013：12）。翻译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现象，一种双语交际行为，需要考虑所有变化因素，包括接受者和社会情景，翻译本身就是有力促进所接触的语言和文化相互渗透的因素（Черняховская，1976：248）。古代西塞罗说，为后代们存留下语篇依据的“不是词量（количество），而是词重（вес）”，词重指的是含义或意义，法国翻译家多雷（1509—1546）认为，译者应该保持五个基本翻译原则，其中之一、二、三个原则便是“译者完善地理解被译语篇的内容和被译语篇作者的意图；译者完善地掌握译出语，同样完美地通晓译入语；避免逐字翻译的趋向，因为这会歪曲原文的内容，扼杀其形式之美”。（Алимов，2013：17）语篇的意义涉及语法、

① 翻译不仅是语言或解释问题，而且是文化问题，不仅语言存在不可译，而且因地缘、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差异导致文化冲突和文化的“不透明性”，产生民族文化不相容性的翻译问题。然而，语言仍在翻译中占有特权地位，语言仍是翻译的根本。提摩塞·布列南在《语言的切换：北/南的东/西》一文中如是说：“我不想把一切翻译都包容在文化翻译的名下，甚至可以说，这样做会剥夺语言的特权。把孟加拉语、他加禄语或帕特瓦语翻译成可读的英语，这些平凡的小事仍在激励人们接受非西方的文学。我所引证的冷战文化的死胡同与帝国的距离和非人性化逻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要回避翻译中语言的相异意图模式的流失问题。这毕竟是使翻译成为耐人寻味的、不可能的任务，但又要求人们去努力尝试的东西，如果没有别的方法向语言致以敬意的话。”（陈永国，2005：306）

语义和语用方面,不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不论是哪个层次的单位,都是通过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来解释其意义。双语互参意义重构译学研究,这是目前现实的、必然的翻译研究课题。

第二节 翻译“意义”观回顾

如何认识翻译中的意义问题,这是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翻译可以说是跨语言交际中的意义重构。但翻译的“意义”观如何?何谓翻译中的“意义”,或者何谓翻译中被重构的“意义”?这是困扰每一个译学研究者的意义理论问题,也是想要解决翻译中的意义问题的学者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富有启示意义的研究,但译学界还远未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国外研究

美国的奈达在《译意》(1982)中明白提出“翻译即译意”思想,这是对翻译实质的概括,强调了意义传译在翻译中的关键作用。“翻译即译意”,这句名言将翻译的根本任务明确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许钧,2003:140)。译意并不表明形式是不重要的,奈达认为,“形式也表达意义;改变形式可能也就改变了意义”。(郭建中,2000:66)奈达的翻译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以来,对我国的翻译研究影响甚巨,原因就在于它的可行性和明晰性。许钧说:奈达的翻译意义研究“对翻译实践具有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且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许钧,2003:166)

但是,翻译中的意义问题实在太复杂了,随着人们对于翻译问题研究的深入,关于翻译中的“意义”的认识就更加深入辩证,除了与译者直接相关外,还与译出语和译入语相关,因为语言不仅是表意的工具,而且具有创造意义的功能。翻译中的“意义”,或涉及相关双语互参互构问题。奈达讲到了形式对等(后改为形式对应)和动

态对等（功能对等）^①，但似乎从未提及相关双语参与意义重构的问题。“形式对等是提供某种程度深刻见解的一种手段，借此窥视某一源语语篇的词汇形式、语法形式或结构性形式。”（哈蒂姆、梅森，2005：9）在奈达那里，为了译意，要么改变形式，要么保留形式对应。他所谓的“形式对应”，就是指在目的语中保留源语的形式结构，不管这种形式结构符合不符合目的语表达形式的规范。针对这一点，申丹在《论翻译中的形式对等》一文中指出，所谓形式对等，是用目的语中的对应形式结构来替代源语中的形式结构（1997）。申丹的这一辩证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翻译中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这样一来，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就能达到更大程度的统一（郭建中，2000：75）。实际上，译入语中的对应形式结构替代译出语中的形式结构，就暗含了译入语的形式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意义重构的意味，确切地说，译出语和译入语都将参与到译文本的意义重构中。因为译文本中语言形式结构的选择，并不是任意的，而是与译出语有所对应，即在考虑译出语的形式结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译入语形式结构。这样，势必会偏离翻译等值的理想，但这就是翻译实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法国的翻译释意派区分了潜在的意义和现实化的意义（2003），释意强调的是释意篇章，不仅与言语交际、语境有关，更与译者有关。20 世纪的“语言学革新”即在于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反映的东西，而且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这也为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认识方法论。许钧说：“该学派对意义的阐述非常明确，其最大的贡献便是区分了潜在的意义和现实化的意义。”（许钧，2003：170）释意派的弟子安帕罗·于诺多·阿尔比在《翻译的“忠实”概念》一书中，发展了释意派理论中对意义的

① 什维策尔说，奈达表述的动态等值概念是基于对于（由语言表达与交际行为参与者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内容的语用成分的考虑，因此什维策尔赞同诺伯特建议的翻译对等两分法，即语义对等（理解为传译原文内容并遵守译入语规范）和语用对等（理解为考虑话语的语用成分）。达到翻译的语用对等，就要放弃完全语义对等（交际不变）。考虑语用因素，可能从异域接受者角度进行文本增删，以及发生各种意思改变（Комиссаров，2002：73-74）。

认识,澄清了七个与翻译有密切关系的概念,并就翻译中经常遇到的这几个概念与意义的异同作了剖析(许钧,2003:170):①含义(signification)、现实化含义(signification actualisee)与意义;②信息(information)与意义;③效果(effect)与意义;④意图与意义;⑤风格(style)与意义;⑥内涵(connotation)与意义;⑦不言之意(implicite)与意义。阿尔比认为,意义是“诸如风格、内涵、信息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综合”。不同类型语篇的翻译,某种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在诗歌中风格与内涵的因素会占上风,而在科技文章中则是信息因素起重要作用。这就是说,意义是个更广泛的概念,“意义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因此,可以说翻译中的“意义”除了基本的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外,还涉及风格意义、蕴含意义、修辞意义、联想—伴随意义等,它们与语体、语言修辞和表达效果有关。翻译与译者的知识、技能^①密切相关,所以翻译中的“意义”,即跨语言、跨语境中实现的“意义”,翻译作为一种意义重构活动,是译者把“潜在的意义”变成了“现实化的意义”。

英国贝尔在1991年出版的《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贝尔,2005)一书中,借鉴语言学成果对“意义”的研究,很值得我们学习。他将意义分为“语义意义”和“交际值”两大类并将二者合并成“语义表征”概念。贝尔还区分了三个主要的意义类型:认知意义、互动意义和话语意义。贝尔区分出的“交际值”、认知意义、互动意义、话语意义,即可涵盖译者影响意义的维度。但在贝尔论翻译的“意义”的大半部书中,好像未见对这层意义的进一步揭示。贝尔在语言学的基础上探讨翻译中的“意义”,涉及语义学、语用学、语篇语用学、话语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领域,他的视野宽广而富有洞察力。许钧说:“贝尔对意义的分析与归类有个明显的特点,

① 罗杰·贝尔认为,译者需要获取五类不同的知识:目的语知识;有关语篇类型的知识;源语知识;学科领域知识;对比知识。译者应具有双语能力、专门知识、交际能力(它至少包括知识和技能的四个方面: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话语能力和策略能力)。译者必须具备双语能力和双文化的交际能力,旨在创建、理解并运用语篇,借此进入对语境敏感(或情景化了)的话语(贝尔,2005:50-61)。

即摆脱以往的纯理论分类……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微观的佐证，具有系统性，而且与翻译实践结合得相当紧密。”（许钧，2003：169）

英国哈蒂姆、梅森的著作《话语与译者》（1990）也可以为翻译领域的更深入研究指明方向：“相对来说，跨文化交际和对比话语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依然处于初创阶段。但是，正是这一事实才为未来带来了一种乐观气息。对翻译过程进行富有成效的分析之路现在已经畅通。”（哈蒂姆、梅森，2005：9）许余龙在《对比语言学》（2005）一书中介绍哈蒂姆（Hatim）的对比篇章语言学翻译理论：“如果说 Catford 的语言学翻译理论主要是以句以下的语言成分对比为其主要理论依据的话，那么 Hatim（1997）的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则试图将翻译理论、对比语言学和话语分析三者结合起来讨论翻译，从对比篇章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宏观的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许余龙，2005：328-329）哈蒂姆、梅森把翻译工作视为发生于社会语境的一种交际过程，强调了翻译作为交际话语的观念，翻译潜在着两种动机：源语语篇产出者的动机和译者的动机（哈蒂姆、梅森，2005：4）。他们从对比篇章语言学角度的翻译研究，于本研究颇有启发意义。

俄罗斯科米萨罗夫早就指出：“翻译的普通语言学分析表明，翻译应视为一种特殊的言语交往形式，在这种交往形式下发生两种语言系统的相关作用（соотнесённое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语言学的任务在于描写这种相关作用过程中语言之间、语言单元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以及描写该过程的语言学前提、特色和条件。”（Комиссаров，1980：6）把翻译视为一种特殊的跨语言交际形式情况下，构成翻译的内部语言学机制的两个语言系统发生相关作用，而语义方面居于主导地位，不同语言语篇的言意等同（смысловое отождествление）作为其交际等效的基础（Комиссаров，1980：51）。因此，翻译研究的任务之一即是描写译出语和译入语之间的各种关系，以揭示双语相关作用对意义重构的影响，亦即揭示翻译过程中双语互参互动的规律。

双语互参式译学研究可谓遥接着国外学者的思路，翻译和翻译研